

DEMOCRACY

包刚升 | 著

民主的逻辑

对民主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盘点
考察其历史演变、兴衰之道、各国现状、挑战及未来

包刚升
| 著

民主的逻辑

The Logic of Democra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逻辑 / 包刚升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201-2581-9

I. ①民… II. ①包…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4257 号

民主的逻辑

著 者 / 包刚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655mm × 965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581-9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民主信心指数波动的背后

如今，民主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又迎来它的“艰难时世”。这种民主的“艰难时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西方国家民主政体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政府公债剧增、贫富分化加剧、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以及政治领导力不足导致的诸种难题。比如，西方世界以外的新兴民主国家则面临着能否完成民主转型、能否实现民主巩固以及能否达成民主治理绩效的很多困难。再比如，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威权主义政体获得了复兴，这甚至使得很多原先信奉民主道路的落后国家开始将这种模式视为实现发展的替代性方案。

正是因为这些现象，目前国际学术界似乎对民主信心不足。关于民主治理绩效和民主未来前景的悲观论调，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今年年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吉布拉特出版了一部名为《民主如何灭亡？》的书。该书上市之后，竟然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两位作者的基调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危机。^[1]而早在五年前的2013

[1]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2018).

年，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乔舒亚·科蓝兹克出版的《民主在退潮》，更是勾勒了全球范围内民主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已经遭遇衰退的政治景象。^[1]实际上，作为一名专长于民主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就类似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除了学术界，全球主流媒体讨论民主议题时同样情绪低落。从英国《经济学人》到《金融时报》，从美国《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最近几年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坏消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民主或许真的迎来了它的“艰难时世”。

然而，2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却是国际社会民主信心指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种民主信心指数的高涨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世界当时不仅已经赢得冷战的胜利，而且以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支柱的新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二是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并首次实现了“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即民主政体数量超越了非民主政体的数量；三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政体陷入颓势，它们看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困境。

那样一个时期诞生了两部标志性作品。一部是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2]另一部是亨廷顿的著名学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

[1]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民主的逻辑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这两部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但都以不同方式记述、解释，甚至预见了解自由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民主化已然成了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政治趋势。

令人好奇的是，就在20多年间，很多人的民主信心指数就从高峰滑入到了低谷。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继续往前看，大约在此前20多年，即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很多新兴民主政体的挫败，由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政体前景黯淡。更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民主化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往前看，再往前推大约20年，即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由于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模仿其欧洲宗主国建立自己的政体，当时的国际社会一度对全球民主事业的前景非常乐观。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民主的乐观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大概每20年到25年就构成一个民主信心指数的周期。人们对民主的信心犹如一个钟摆，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摆动。或者，如同人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周期，人们的民主信心指数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期性特征。

借助民主信心指数周期的视角，我们就更好理解，当我们在短期中考察民主问题时，很容易为一时一地的重大事件所左右，或者很容易为一时之间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所引导，而忽视民主问题背后更长期的结构因素、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如果是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非稳健的理性判断左右着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就容易导致我们对民主前景和世界格局的误判。

所以，能否基于一般的逻辑而非一时的情绪，能否基于历史的经验而非纯粹的学理，能否基于全球视野而非个别的案例来理解民主与民主化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这正是我撰写《民主的逻辑》一书的初衷。

本书既无意过分赞美民主，无意把民主视为一剂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更无意贬损民主，无意把民主视为一种必然导向选人不当、低效治理，甚至多数暴政的坏制度。本书希望的是，能够基于学理逻辑和实证经验，对民主与民主化的各种关键议题进行客观、公允、中立的考察，把民主的好与坏、民主化的成功与失败、民主治理的高绩效与低绩效、民主前景的乐观展望与悲观预期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自己的理性思辨与独立判断。

具体来说，《民主的逻辑》涉及六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从古到今思想史上的民主论战、现代民主如何起源、民主政体如何扩散到全球、民主盛衰原因论、如何理解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以及对人类未来民主前景的展望。作者的目的是，借助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读者能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民主有关的诸问题，进而形成一种更为清晰的民主观。这也是作者对每一位读者的最大期许。

最后，我还要简单但隆重地表达致谢。我过去的学术经历，主要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所高校和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有关。在这两所高校和两座城市（当然不限于此），既有很多曾经教导我、勉励我的前辈与长者，又有很多跟我一起切磋学问、互相砥砺的学友与同行，还有期刊界、媒体与出版界很多相交已久、相知甚深的朋友们——包括推动本书撰写和出版的几位重要人士。碍于篇幅和种种原因，我无

法一一列举其中数十位，甚至上百位我要感谢的人士。当然，我最重要的感谢还是要留给自己的家人。如果不是我夫人及两个女儿的激励，如果不是我父母和岳父母的全力支持，我就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

是为序。

包刚升

2018年3月1日于新江湾城

目 录

第1讲 民主大论战：诸种争论的起源 / 001

- 1.1 民主在雅典城邦的命运 / 003
- 1.2 为什么说混合政体是更好的统治类型? / 015
- 1.3 托克维尔与民主大论战的转向 / 022
- 1.4 民主概念的三个版本 / 032
- 1.5 高调的民主理想与无奈的民主现实 / 040
- 1.6 民主是自由之敌还是自由之友? / 047

第2讲 民主作为政治发明：从古希腊到近代英国 / 057

- 2.1 政治改革与雅典城邦民主的运作 / 059
- 2.2 共和政体与古罗马文明的崛起 / 069
- 2.3 立宪传统与英国议会政治的登场 / 080
- 2.4 普选权与英国民主化的完成 / 090

第3讲 民主化的三次浪潮：从19世纪到21世纪 / 101

3.1 民主演进的两百年 / 103

3.2 第一波民主化：源起欧美 / 113

3.3 第二波民主化：走出西方 / 132

3.4 第三波民主化：全球时代 / 147

3.5 “阿拉伯之春”还是“阿拉伯之冬”？ / 161

第4讲 民主兴衰原因论：理论路径的分野 / 169

4.1 为什么是这些国家？ / 171

4.2 条件论：民主可以移植吗？ / 179

4.3 制度论：民主模式的多样性 / 206

4.4 精英论：政治精英扮演何种角色？ / 234

第5讲 民主治理的绩效：民主能带来善治吗？ / 245

5.1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 247

5.2 民主能带来经济增长吗？ / 252

- 5.3 民主与公共治理 / 266
- 5.4 更民主，更平等？ / 274
- 5.5 民主引发更多政治冲突吗？ / 285

第6讲 民主未来的展望：人类往何处去？ / 297

- 6.1 西方世界民主治理的挑战 / 299
- 6.2 新兴民主国家的转型难题 / 327
- 6.3 威权政体的困境、复兴与前景 / 337
- 6.4 不完美的人类，不完美的未来 / 350

第1讲

民主大论战： 诸种争论的起源

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1.1 民主在雅典城邦的命运

如今，“民主是个好东西”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国内学界的这一说法，较早来自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 10 年前出版的一本访谈录，访谈录的题目就叫《民主是个好东西》。^[1]该书面世后广受欢迎，多次再版，引发了学界和媒体的热议。

亨廷顿政治观点的转向

事实上，“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更早出现在另一部作品中。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的序言中，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有这样的说法：他过去撰述《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因为他当时相信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a good thing）；他如今出版《第三波》，是因为他此时相信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

亨廷顿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于 1968 年。^[2]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知道，很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 1960 年前后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当时西方政治学界有一种颇为乐观的预期。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按照欧美模式来设计政治制度，那么它们就会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框架。这样，

[1] 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这些国家既能够享有自由民主，又可以实现政治稳定，同时还能实现善治和繁荣。但是，真实的故事却是，亚洲和非洲的很多新兴国家遇到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大量国家遇到了民主运转上的困难，陷入了政治不稳定或政治冲突，甚至还走向了内战。比如，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从以民主方式独立建国到军事政变和内战只用了6年时间。

所以，对发展中世界的真实政治运作有了实际观察之后，亨廷顿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跟西方政治学界的乐观预期完全不同。他认为，对这样的国家来说，首要的恐怕不是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能否实现“政治稳定”的问题。只有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政治稳定。所以，1968年的亨廷顿这样说：“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这也是他撰写《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初衷。

然而，时隔23年后，到了亨廷顿出版《第三波》的1991年，他的观点却发生了重要转变。^[1]他再次敏锐地观察到，发展中世界的政治正在出现某种不同以往的全新变化。简而言之，一场新的民主革命自1974年在南欧启动以来，正在快速波及全球。此时的亨廷顿认为，民主不仅会促进个人自由，而且还会促进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如何面对这场全球民主革命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政治议题。所以，1991年的亨廷顿这样说：“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

那么，为什么亨廷顿20余年间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观点转向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一开始认为“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而后来他却认为

[1]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民主的价值高过了其他事物呢？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涉及一场古老的政治论战。

伯里克利盛赞雅典城邦

民主究竟是不是个好东西？这场论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古典民主达到了它的高峰，这种城邦民主延续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当然，雅典城邦时期的政治生活前后经历了很多复杂的变化。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记录了公元前431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一篇著名演讲。这篇演讲被后人视为赞颂雅典民主的名篇，也是我们今天赖以了解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重要文本。作为当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伯里克利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

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

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

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1]

在这篇演讲中，伯里克利为我们提供了雅典城邦民主的很多关键信息。比如，他强调雅典城邦政治制度和宪法的首创性，认为雅典的政制不同于古希腊的其他城邦——包括另一著名城邦斯巴达；比如，他定义了民主，所谓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比如，他自豪地提及雅典城邦的法治特征，坚信雅典的法律在解决争端方面能为每个人提供平等与正义——在全球文明史的同时期，大概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又比如，“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这段话是在强调雅典城邦的政治平等以及公共职位对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这也堪称2500年前人类政治平等的奇迹。

再比如，伯里克利提及政治自由与私人关系的宽松自在并存时，他实际上已经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那个时代，雅典就做到了尊重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今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似乎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公私领域区分的问题。对这些国家而言，如何保证每个公民在私人领域享有完整的自由和充分的自主，仍然是一个挑战。主张政治自由的同时，伯里克利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由此看来，当时雅典城邦的公民一方面享有充分的

[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101页。